

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

近思錄全譯

〔南宋〕朱熹 呂祖謙 撰集 于民雄 譯注



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〔南宋〕朱熹 吕祖谦 撰集

于 民 雄 译注

近思录全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近思录全译 / (宋)朱熹, 吕祖谦撰集; 于民雄译注.
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0.4

(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. 第2批)

ISBN 7-221-05020-1

I. 近… II. ①朱… ②吕… ③于… III. 周敦颐-
理学-箴言-注释 IV. B24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57346号

近思录全译

[南宋] 朱熹 吕祖谦 撰集 于民雄 译注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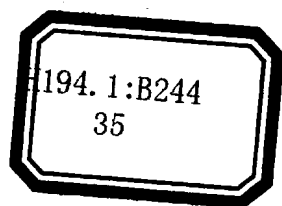
贵阳宝莲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5.125印张 378千字

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册

ISBN7-221-05020-1/13·122 定价: 18.00元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
1996年~2000年出版规划重点项目

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（第二批50种）

王元化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、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，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，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，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。

湖北江陵人，生于1920年11月30日。1946年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，1950年起任震旦大学、复旦大学兼职教授，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。1955年因胡风案件牵连受审查，工作中辍。

王元化自3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，迄今已出版的专著有《抗战文艺论文集》(1939)、《文艺漫谈》(1945)、《向着真实》(1953)、《文心雕龙创作论》(1979年初版，1993年增补版，改名《文心雕龙讲疏》)、《文学风格论》(译文集，1983)、《文学沉思录》(1983)、《传统与反传统》(1990)、《思辨短简》(1990、1994再版增订改版为《思辨随笔》)、《清园夜读》(1993)、《清园论学集》(1994)。

王运熙 上海市金山县人，1926年生。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，留任助教，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。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、三、四届副会长，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三、四届副会长等。主要著作有《六朝乐府与民歌》、《乐府诗论丛》、《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》、《文心雕龙探索》、《中国古代文论管窥》、《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》(与杨明合著)等；主编的有《李白诗选》、《李白研究》、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(三卷本)等。

李万寿 (常务) 贵州清镇人，1942年3月生。现任贵州人民出版社社长，编审。著作有《晏子春秋全译》、《贞观政要译注》(合著)、《历代名著序跋选注》(合著)、《古文精华》(合著)、《茶花女》(缩写本)，此外有历代文学名篇赏析十余篇，收入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历代文学名篇欣赏》丛书。并用理宣、木子等笔名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章数十篇。

袁行霈 江苏武进人，1936年4月生。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

编委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中文系，留校任教，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、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《国学研究》主编等职。主要论著有《中国诗歌艺术研究》、《中国文学概论》、《中国诗学通论》（合著）、《中国文言小说书目》（合著）等。

程千帆 湖南宁乡人，1913年生。金陵大学文学士，曾在金陵大学、四川大学、武汉大学长期执教。现任南京大学一级教授，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、中华大典编纂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会长、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、南京市文联名誉主席。主要著作有《文论十笺》、《古诗考索》、《史通笺记》、《校讎广义》、《两宋文学史》等（后两种系与人合著）。

傅璇琮 浙江宁波人，1933年生。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现为北京中华书局总编辑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，兼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。1992年起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。主要著作有：《唐代诗人丛考》、《李德裕年谱》、《唐代科举与文学》、《河岳英灵集研究》、《唐诗论学丛稿》、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、《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》、《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》，主编《全宋诗》、《唐才子传校笺》。

李立朴（执行） 河北安平人，1954年5月生于西安。1986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，文学硕士。现任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，副编审。著作有《许浑研究》、《唐才子传全译》以及论文十余篇。

黄涤明（执行） 湖南邵东人，1947年生于贵州平塘。1982年广西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。获文学硕士学位。中国训诂学会会员。副编审。出版著作有《搜神记全译》、《贞观政要译注》（合著）、《历代名著序跋选注》（合著）、《古文精华》（合著）等。

出版说明

本丛书是国家“八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《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》（50种）的后续项目。该丛书陆续问世以来，得到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赞扬，荣获中宣部1993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，不仅在全国书市上被评为“最受读者欢迎的书”，而且在欧美汉学界十分流行，备受重视，对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。

为满足中外读者要求《丛书》扩大规模、增加品种的强烈愿望，我们在50种书目的基础上，继续慎重选取四部名著50种（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）作为《丛书》的第二批书目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。在书目的取舍上，经部选取7种，从而将“十三经”全部出齐；史部的重点除《史记》外，决定选取我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巨著《畴人传》以广泛传播中华科技先驱的事迹；子部之书，除两汉外，补充了宋明理学名著，艺术类、宗教类名著和历代的一些著名笔记；集部则突出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人别集，并增加了首批未上的一些名著选本，《书目》仍附于各书卷末。

本丛书（第二批50种）已被列入国家“九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，我们将在全国学术界专家的鼎力支持下，加倍努力，把一套兼具权威性、通俗性、学术性、资料性的精品图书奉献给广大读者。

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

1997年7月

前 言

《近思录》成书于南宋淳熙二年（1175），著名理学大师朱熹、吕祖谦合编。书名取《论语·子张》“切问而近思”之义；内容择自《太极图说》、《易通》、《西铭》、《正蒙》、《经学理窟》、《二程遗书》、《易传》等有关著述，集北宋哲学家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和张载的主要言论而成。全书分为道体、为学、致知、存养、克治、家道、出处、治体、治法、政事、教学、警戒、辨异端、观圣贤等十四门，凡六百二十二条，为阐述儒家性理的概论之作。

一

《近思录》既为朱熹、吕祖谦合编，又全面展现了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的基本思想，故该书可视为双重合作的产物。了解《近思录》，与了解上述六人的生平、事迹、思想有关，亦为解读《近思录》提供背景知识准备。职是之故，有必要对朱熹等六位学者作一简要介绍。

朱熹（1130—1200）字元晦，一字仲晦，号晦庵，别称紫阳，晚号晦翁等。徽州婺源（今属江西）人，侨居建阳（今属福建）。绍兴十八年（1148），登进士第。后历任泉州同安主簿、知南康军、知漳州、秘阁修撰等职。庆元二年（1196），落职罢祠。时韩侂胄专权，党禁猖狂，其学被目为“伪学”。方是时，稍以儒名者，无所容其身。后党禁松弛，其学亦渐得见用。嘉定二年（1209），朱

熹被赐谥为“文”，旋赠中大夫，特赠宝谟阁直学士。理宗宝庆三年（1227），赠太师，追封信国公。淳祐元年（1241），理宗手诏：以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及朱熹“从祀孔子庙庭”。

朱熹早岁从父朱松学，后师事李侗。一生孜孜不倦，“博极群书，自经史著述而外，凡夫诸子、佛老、天文、地理之学，无不涉猎而讲究也^①”，堪称古代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。哲学上，朱熹认为理、气不能相离，“天下未有无理之气，亦未有无气之理^②。”但又断言理为形而上之道，理是本，逻辑上先在；气为形而下之器，气在后。道德上，朱熹强调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的对立：“圣贤千言万语，只是教人明天理，灭人欲^③。”人的存在依归，指向“天理”；人通过“居敬”、“穷理”的道德实践工夫，实现人的目的；复归“天理”，即是人的完满——它内在于人的神圣性与合目的性。知识论上，朱熹强调“即物穷理”，知识源于经验，“格物”是获得知识的前提。

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，其思想被视为儒家正统，支配中国思想界达六百年之久。其主要著作有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周易本义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楚辞集注》、《太极图说解》、《资治通鉴纲目》等，以及后人编纂的《朱文公文集》和《朱子语类》等。

吕祖谦（1137—1181）字伯恭，学者称东莱先生。婺州（今浙江金华）人。孝宗隆兴元年（1163）中进士第。历任秘书郎、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、著作郎等职。与朱熹、张栻齐名，时称“东南三贤”。全祖望说：“宋乾、淳以后，学派分而为三：朱学也，吕学也，陆学也。三家同时，皆不甚合。朱学以格物致知，陆学以明心，吕学则兼取其长，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^④。”吕氏学术折中朱熹、陆九渊之学，又吸收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，自成一派，人称“婺学”，影响颇大。

吕祖谦为学主“明理躬行”，崇尚讲实理，育实才，求实用，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。主张治经史以致用，重视历史研究与文

献整理，提倡以史为鉴，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智慧。凡此种种，开浙东学派先声。著作有《东莱集》、《东莱左传博议》、《吕氏家塾读书记》、《东莱书说》等。编有《宋文鉴》、《古文关键》等。

周敦颐（1017—1073）字茂叔。道州营道（今湖南道县）人。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，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，后人遂称濂溪先生。曾先后任分宁县主簿、南安军司理参军、桂阳县令、大理寺丞、合州判官、虔州通判等职。晚年为提点广南东路刑狱、知南康军，“为政精密严恕，务尽道理^⑤。”

周敦颐为二程师，其再传、三传弟子有杨龟山、罗仲素、李延平、朱熹等，周氏遂被奉为宋代理学开山祖师。

周敦颐依据《易传》、《中庸》及道家与道教思想，构建以“太极”为本体创化阴阳万物的宇宙生存论模式，且为儒家道德人性论确立形上根据，对后世理学发展有开创作用。著作有《太极图说》、《通书》等，后人编为《周子全书》。

程颢（1032—1085）字伯淳，世称明道先生。河南洛阳人。少时受父命，与弟颐同师事周敦颐。嘉祐年间，举进士第。曾为上元主簿，晋城、扶沟县令。为官廉洁，有政绩，后经吕公著推荐，为太子中允、监察御史里行。对王安石新政持有限反对立场。在洛阳讲学十余年，弟子有“如坐春风”之喻。为理学创始人之一。嘉定十三年（1220），谥纯公；淳佑元年（1241），封河南伯，从祀孔子庙庭。

程颢著作有《定性书》、《识仁篇》等。后人所编《遗书》、《文集》、《经学》等，收入《二程全书》。

程颐（1033—1107）字正叔，世称伊川先生。河南洛阳人。颐幼聪敏，年十八，上书阙下，“欲天子黜世俗之论，以王道为心^⑥。”又游太学，其文为胡瑗称道。由司马光、吕公著推荐，受诏为西京国子监教授、秘书省校书郎，旋提为崇政殿说书。哲宗时，被斥为奸党，削籍流放涪州。徽宗即位，被赦还洛阳。一生不喜仕

进，讲学达三十余年。与其兄程颢同为理学奠基者，世称“二程”。嘉定十三年，谥正公；淳佑元年，封伊川伯，从祀孔子庙庭。

程颐著作有《易传》、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等。后人所编《遗书》、《文集》、《经学》等，收入《二程全书》中。

程颢、程颐思想基本一致，其范围不出天理本体论、心性人性论、道德修养论。细微差异为：程颢为学以“识仁”为主；程颐为学以“穷理”为本。“二程”学说后为朱熹承继与发展，世称“程朱学派”。

张载（1020—1077）字子厚。凤翔郿县（今陕西眉县）横渠镇人，世称横渠先生。少好谈兵，“年十八，慨然以功名自许^⑦。”后承范仲淹教诲，致力《中庸》。出入佛老，究其说，终无所得，返求之《六经》。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举进士第，为祁州司法参军、云岩令。熙宁九年（1076）除崇文院校书，与朝官不合，辞官西归故里。

张载讲学关中，故其学称为“关学”。为北宋“五子”（邵雍、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）之一，理学创始人之一。以恢复古代井田制为政治理想。提出“太虚即气”说，肯定“气”是充实宇宙实体——“气”聚散变化，形成万物。其学以《易》为宗，以《中庸》为体，以孔孟为法。主张通过“变化气质”，成就至善的“天地之性”。著作有《正蒙》、《易说》、《经学理窟》等，编入《张子全书》。

二

中国学术，源远流长。自先秦子学以降，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隋唐佛学、宋明理学起伏此起彼伏，洋洋大观。宋代理学，承继孔孟儒学，亦批判、吸收佛道思想，自成一体。理学即人学，亦即道德形上学。集大成者朱熹，其思想与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一脉相承。不言而喻，《近思录》作为集中代表周、二程、张基

本思想的作品，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；其编排次第，符合朱熹哲学体系的内在价值与逻辑理路。

理学是系统化哲学体系，本体论构成整个思想大厦的基石。故《近思录》十四门中，《道体》排列第一，开宗明义直指大本大原。周敦颐说：

“无极而太极。太极动而生阳，动极而静，静而生阴，静极复动。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；分阴分阳，两仪立焉。阳变阴合，而生水火木金土，五气顺布，四时行焉。五行一阴阳也，阴阳一太极也，太极本无极也。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。无极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。‘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’二气交感，化生万物，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。”^⑧

这即是著名的“太极”本体创化万物的宇宙生存论模式。但，从这一宇宙论，周敦颐引出“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，而主静立人极焉”的价值指归。张载亦然。张载说：“游气纷扰，合而成质者，生人物之万殊^⑨。”但，从气一元论，张载引出“立天地之大义”、“无非教也”的价值结论。从自然本体引出价值，建构道德形上学，是理学的本质所在。质言之，自然本体即道德本体。自然本体无非抗拒佛教空幻论的批判武器，在儒学心性论体系中，它只具有从属地位。宋儒所谓的“天”、“理”、“道”——作为本体的不同称谓，是一切价值的终极来源。程颢说：“盖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。其体则谓之易，其理则谓之道，其用则谓之神，其命于人则谓之性，率性则谓之道，修道则谓之教。”^⑩这一本于儒家经典的概论，表述的正是天人合一的理念。儒家的真精神，从“天理”开出，亦内在于人心，它先验地赋予人的神圣性。所谓“体道”，即体悟性理至善的原理，在根本点上把握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

“学”属于经验范畴。但在儒学道德形上学体系内，“学”与终极价值密不可分，受内在性理牵引，指向并成就完满人格。

“学”是儒家的传统。“学”作为道德主体的实践活动，具有广泛的含义。《近思录》所列的《为学》、《致知》、《存养》、《克治》诸门，大致属于“学”的范围。

人性善——真实的道德自我内在人心，是宋儒的先验设定。但，人内在的善性并不等同于实存的人格。完满道德人格是修养的结果。善性只是完满化的可能，“学”作为实践工夫，实属完满化的必要条件。

“学”以圣人之道为终极归依。圣人之道作为历史实在，展现在儒家经典之中，它集价值理念、历史智慧、文化精神、人格理想于一炉，代表整全真理。《六经》及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以文字载道，但决非文辞而已。体悟儒家真精神，不啻读经的根本路向，故“以博闻强记、巧文丽辞为工，荣华其言，鲜有至于道者^①”。经有难易之别，故宋儒强调循序渐进之法。程颐说：“初学入德之门，无如《大学》，他莫如《语》、《孟》^②。”读经由浅入深，于一事一义理会，学习领悟不辍，是求道明理的工夫。所谓“致知”，即在“格物”基础上，最终达到对儒家义理的全面把握。

圣道体用同源，即体即用，知行一体，相互作用。但体用、知行在概念上各自具有独立的含义。“致知”为人性完满提供知识论支援，但日用道德学问是“天理”的具体落实。理事的圆融表征体用、知行的统一。宋儒注重问学，强调在伦常日用中提升自己，依据的是儒学实践论的本质要求。它体现在方法、要求、过程、态度、意义等方方面面，构成一学道成圣、相互关联的有机系统。

方法上，宋儒有一套朴素而切实的经验：

“人之蕴蓄，由学而大。在多闻前古圣贤之言与行，考迹以观其用，察言以求其心。^③”

“孟子才高，学之无可依据。学者当学颜子，入圣人为近，有用力处^④。”

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五者废其一，

非学也^⑮。”

“朋友讲习，更莫如相观而善工夫多^⑯。”

如此等等，止为大略，亦可见宋儒对方法的重视。方法有特定功用，但方法内在于目的。目的实现的前提是立志。所谓“志伊尹之所志，学颜子之所学^⑰”，“先立其大者^⑱”，是学圣人之道的应然之义。志纯粹如一，与外在功名、得失、毁誉无涉。故宋儒对一切私欲杂念持否定立场，阻断一切“义”外覬觐之心。志超越时空制约，与空谈性命格格不入；志同时有待日用证验，伪志必然半途而废。志要求自觉陶铸锻炼，成就道德人格具有主动性、严肃性、长久性、艰巨性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宋儒之所以主“诚”、“敬”为本，守护心性，直指“天道”（如“毋不敬，可以对越上帝^⑲”，“涵养吾一^⑳”），亦倡经验论路径，格一事一物，力行致用，基于存在论的神圣律令，两者相互发明，相得益彰^㉑。

《家道》讲齐家。齐家是儒家传统格致诚正、修齐治平八条目之一。孝弟是修身之本，宋儒注重齐家，自在情理之中。家系人与国之中介，是社会的缩影。家庭反映社会面貌。饮食起居、人情世故、交往应酬、婚丧嫁娶，构成生活本身。《家道》所举，不乏经验教训之谈：

“世人多慎于择婿而忽于择妇。其实婿易见，妇难知，所系甚重，岂可忽哉^㉒。”

“人无父母，生日当倍悲痛，安忍置酒张乐以为乐，若具庆者可矣。^㉓”

但家庭生活琐细实际，不胜警戒；警戒有针对性，例证有限定性。故齐家，必须把“多”抽象为“一”，以为基本原则。程颐说：“正伦理，笃恩义，家人之道也^㉔。”依据人伦秩序的内在要求，遵从仁义孝弟的道德精神，家庭人际关系及生活遭遇之种种，可以迎刃而解——，是原始儒家的基本观念，也是宋代理学家的基

本观念。

儒学与佛、道哲学不同，是入世之学。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家社会政治理想，要求儒者参与政治。《近思录》中《出处》、《治体》、《治法》和《政事》诸门，大致属于儒家政治思想范畴。

济世是士人的当然之理。“圣贤之于天下，虽知道之将废，岂肯坐视其乱而不救^②？”但作为现实选择，儒家并非无条件、无原则地鼓动士人投身政治。出仕是儒者的政治切入点，亦代表士人的积极姿态，但退隐决非意味背离救世原则。士人可以根据世道时势之几，保留退隐的权利。退隐基于不得已，并内含俟机而作。出仕虽内在于儒家政治理念中，“然去就取舍，唯义之从^③。”孟子说：“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孔子也^④。”孔子的明智策略，代表宋儒出处观的立场。

儒家的价值理念需要在历史文化中落实，士人出仕从政，履行的是责任与使命。毋庸置疑，儒家的终极关怀指向人间理想国的建立。但儒家的社会理想，本质上是道德观念的投射，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前提，使政治附属于道德，亦使儒家政治哲学具有强烈的精英政治色彩。这一道德——政治论，起源于上古时代，孔子集大成并奠定基本范式。宋儒关于政治建构的学说，是孔孟原创思想的支脉，精神不出儒家藩篱。宋儒说：

“得邱民则得天下。^⑤”

“治天下以正风俗、得贤才为本。^⑥”

“君仁莫不仁，君义莫不义。天下之治乱，系乎人君仁不仁耳^⑦。”

“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，治之道也。^⑧”

这就是儒家的道德——政治论，概言之，即“内圣外王”之道。宋儒反复推崇的所谓王道、仁政、礼制，反复张扬的所谓诚敬、公心、爱民，反复批判的所谓霸道、邪心、暴力等等，彻上

彻下包含在“内圣外王”之道中，凸现儒家一脉相承的道德——政治体系的基本价值理念。

《教学》乃经验之谈，但儒家传统教育原则、目的、方法蕴含其中。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均以桃李满天下著称于世，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《教学》一门凡二十二条，虽不足以概周、二程、张教育思想之全貌，但摘选精当，可窥其本旨。宋儒认为，成就君子人格非一朝一夕之功，亦不离一时一事的社会实践。故宋儒强调幼儿教育，主张“先传以小者近者，而后教以大者远者”^②，日常生活的事事物物，都与培养理想人格息息相关。宋儒的教育思想，是方法论与目的论的统一，最好的表述是程颢所说的“古之教人，莫非使之成己；自洒扫应对上，便可到圣人事。”^③宋儒关于教学相长、恪尽职守、因材施教等生动表述，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财富。

《警戒》一门，亦经验之谈，要在阐明事理，让人警省。人生遭遇，大致祸福、是非、公私、荣辱之间，以克己为本，以警戒为法，可以抑制私欲，可以减少谬见，可以避免耻辱，可以成全人格。宋儒认为，就道理而言，警省之所以必要，因为人时时有落入陷阱的可能。越是人们不加注意的地方，越是真实的危险；越是人欲耽恋的对象，越容易招致损害。贪图逸豫是人之常情，但宋儒则认为“处豫不可安且久，久则溺矣”^④，最终导致身败名裂。计较得失利弊，亦常人难免，但宋儒认为，贪利害义，有损人格，得不偿失。关于警省，宋儒不乏发人深省之言：

“富贵骄人固不善，学问骄人，害亦不细”^⑤。

“虽公天下事，若用私意为之，便是私”^⑥。

“阅机事之久，机心必生。盖方其阅时心必喜，既喜则如种下种子”^⑦。